

伊斯兰势力的“重整和分化”与我国中东公共人文外交之应对^①

马丽蓉

内容提要：中东剧变推助了中东地区伊斯兰力量的此消彼长，“重整和分化”已成为主要的发展态势；原因在于，一是阿拉伯社会民众社会诉求改变的表现、二是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重塑的表现、三是阿拉伯民众欲挣脱阿拉伯“和平与民主”困境的表现；这场复杂的阿拉伯民主运动更使得我国的中东人文外交面临诸多挑战，但却蕴含更多新机遇，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伊斯兰极端主义 伊斯兰中间主义 伊斯兰温和势力 中国中东外交 人文外交

作者简介：马丽蓉，博士后，教授，博导，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阿拉伯世界研究》常务副主编。

自“9·11”以来，伊斯兰势力的全球化、中东政治的伊斯兰化等倾向日趋明显，2011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广场抗议则是“源自阿拉伯社会内部”、集体表达穆斯林要求“满足民主对制定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在内的全面改革计划的愿望”的一场内生型的民主运动。其中，北非伊斯兰政党的群体性崛起、穆尔西为代表的穆兄会领袖的掌控国家政权等，均表明在该地区政治生态中，已“将伊斯兰文化宗教优势作为另一个选择提到了首位。”^②因此，中东伊斯兰势力的发展及其走向，既对地区和世界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使我国的中东外交面临严峻的挑战。

—

这场仍在持续当中的中东剧变推助了中东地区伊斯兰力量的此

^①本文属教育部哲社研究专项委托项目（12JF01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GJ033）、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GJW021）、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08JZD0039）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资助。

^②德米特里·谢多夫：《利比亚暴动及其波及范围》，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 2011年2月24日。

消彼长，“重整和分化”已成为主要的发展态势。其中，

（一）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号召力日渐衰落

“9·11”事件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就面临着两难的抉择：要么站在美国一边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要么庇护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若选择前者，伊斯兰国家政府公开支持西方基督教反穆斯林的联盟就是一个风险巨大的行动；若选择后者，阿拉伯国家将因与恐怖组织有关联被列入“邪恶轴心国”而遭受美国的经济制裁或军事打击。基于一种素朴的泛阿拉伯信仰共同体的认同本能，本·拉登反抗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在每一个伊斯兰国家都能找到同情者甚至追随者，美国反恐十年来“越反越恐”就是明证。但随着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程度的加深，“是该变愤怒为力量，变忧伤为工作，把责备、谴责转变为负责任的行动和缜密的计划了。”^①2011年的阿拉伯民主运动就使得“基地”组织的极端意识形态在阿拉伯世界明显失去了吸引力，其长期采用“圣战”手段来反对“三个敌人”——美国、以色列以及亲美的阿拉伯国家现政权的“3+1”模式遭到重创：这场来势迅猛的阿拉伯民众运动“回避了‘基地’组织信条的两大中心原则：暴力和宗教狂热。抗议者使用了防御性武力，对伊斯兰教进行了重新思考，并支持民主，而这些则是本·拉登及其追随者所不愿看到的。”^②换言之，阿拉伯民众主要采用广场集会抗议的方式，推翻了突尼斯、埃及等国亲美的现政权，表达了对美国等西方大国外来干预的强烈不满，

^① [埃及]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著、朱威烈等译：《十字路口》，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② 斯科特·沙恩：“在阿拉伯世界政权倒台知己，‘基地’组织见证历史飞逝”，载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1年2月27日。

并对以色列的内政外交造成巨大冲击，以“和平”手段实现了“基地”组织的“三个目标”，全面颠覆了其所奉行的“3+1”模式。2011年“阿拉伯国家的事态发展对崇尚暴力的圣战主义来说是一种战略上的失败。”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比2001年分布更为广泛、成员有可能更多且影响力肯定更大的运动。”^①而2011年5月1日本·拉登被击毙、5月28日“基地”组织分支宣布在也门南部建立“伊斯兰酋长国”等证明：“基地”组织不是这场阿拉伯民主运动的主角，而是一个实力被严重削弱后试图搅局渔利的看客。^②（补充“民调称全球穆斯林早已不信拉登 肯定度大幅下滑”2011/05/05 中国新闻网）

（二）伊斯兰“中间主义”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中间主义”的倡导者优素夫·格尔达维等阿拉伯学者认为，任何“不及”或“过激”言行有悖于伊斯兰信仰，以伊斯兰名义支持甚至从事恐怖主义活动，都从根本上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和平本质；要想彻底根除恐怖主义，就必须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复杂根源，反对恐怖主义必须同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进社会变革和民主进程是解决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社会困境的当务之急，但须以对话方式循序渐进地进行，不可诉诸暴力，更不能通过外部力量的施压来实现；教法创制要不断吐故纳新、与时俱进，教法裁判不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时空的不断变迁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要求人们将“文本的法学”变为“流动的法学”，要求我们在今天这

^① 斯科特·沙恩：“在阿拉伯世界政权倒台知己，‘基地’组织见证历史飞逝”，载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1年2月27日。

^② 马晓霖主编：《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页。

个时代，应当重新审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观点或被采纳过的一些意见。^①亦即，伊斯兰“中间主义”旨在“引导建立中正均衡的宗教价值观、和平民主的政治价值观、多元共生的文明对话观、教法创制的法律改革观、公平和谐的社会发展观等，将中间主义与公正、宽容等教义并列作为政策主张，以期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划清界限”^②，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9·11”以来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偏见和对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的误读。尽管“中间主义”思潮并非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但它坚守文化根源，致力于文化创新，努力挖掘伊斯兰教的中正思想和自我更新能力，为应对全球化挑战、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和实践论，以期达到伊斯兰世界自我解困、自我调适和自我更新的目的。正因为“中间主义”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它已被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所广泛关注，如埃及于1996年成立了中间党，卡塔尔、沙特和科威特等国已建立相关的研究、宣传机构，一些研究成果也相继见诸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③，此次阿拉伯民主运动又将“中间主义”思潮的影响由社会精英群扩至草根阶层，既有助于向全社会宣传和普及“和平、中正”的伊斯兰核心价值观，也有助于抵制“伊斯兰威胁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还有助于建构全球治理中多重价值体系的治理观。

（三）伊斯兰温和势力正成为中东地区重要的政治力量

在此次阿拉伯民主运动的议会选举中，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

^① 王铁铮：《新思潮：伊斯兰中间主义》，载《南方》2010年第7期。

^② 朱威烈：“韬光养晦：世界主流文明的共有观念”，载《文汇报》2010年8月18日。

^③ 王铁铮：《新思潮：伊斯兰中间主义》，载《南方》2010年第7期。

动、摩洛哥的正义与发展党、埃及的自由与正义党、光明党等纷纷走向政治前台，利比亚过渡委负责人表示今后要以伊斯兰教为立法基础……种种迹象表明，伊斯兰温和势力正通过议会道路谋求崛起，“新一代阿拉伯—伊斯兰分子表现得非常灵活，在不放弃自身价值观的情况下，尽量适应当今的全球化世界。”^①最明显的就是创建于1928年的穆兄会，是一个起源于埃及、影响力遍布中东乃至全球的穆斯林群众性组织，甚至被视为近代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并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政治集团。其中，埃及穆兄会依托清真寺开展社会慈善以及坚定的反以、反美立场，更是赢得了较为广泛的民意支持。该组织于1938年由社会、文化活动转入政治斗争，并以建立伊斯兰国家为最终目标。1982年后又放弃暴力活动，与激进、极端的伊斯兰势力保持距离，并开始间接参加议会政治。在2005年埃及大选中赢得88个议席而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反对派。在2010年议会选举中因一席未得而抵制了第二轮选举。2011年4月成立的自由正义党使得穆兄会极有可能通过民主选举程序获得埃及未来的掌控权，特别是其在埃及社会转型中所表现出的成熟与稳健，不仅关乎埃及“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走向与民族未来，也关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和地区政治力量的发展与重组，并对世界与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产生深远的意义。尽管西方学者也承认“伊斯兰主义者将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却担忧“伊朗模式”的重现。其实，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主义者在选举中的胜利从未导致过神权统治，新当选的

^① 阿列克谢·马卡尔金：“伊斯兰进行曲”，俄罗斯政治评论网2011年10月27日。

伊斯兰主义者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实施神权统治。“伊斯兰主义的发展是穆斯林社会对加速西方化作出的特殊反应。处于伊斯兰分子影响之下的有 10 多亿信徒，有 50 多个穆斯林国家，有在 120 个国家里的穆斯林社团。这在国际关系中造成很多问题，涉及许多国家和所有世界大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其中，“政治化的伊斯兰成为阿拉伯东方几乎所有国家政治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说，它在社会经济上取得的实际成果远远赶不上诸多的承诺，但是不能不承认，它的意识形态对穆斯林居民的影响仍相当大。”而且，“当代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明显呈现出跨国性质，对整个中东政治形势变化反应敏感，已经无法按照国界来逐个消除政治化的伊斯兰主义的策源地。”^①

二

2005 年美国“大中东民主改造”的结果是哈马斯等伊斯兰激进势力赢得大选而“劫持了民主”，2011 年阿拉伯民主运动则使得各种伊斯兰势力“重整和分化”态势日趋明显，成为世界民主化浪潮中的特殊政治现象，也成为仍在持续中的阿拉伯民主运动的重要特征。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阿拉伯社会民众社会诉求改变的表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着贫富不均、物价飞涨、失业率攀高、人口激增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最终促使无成就的（unfulfilled）、未被接纳的（unincluded）、未充分就业的（underemployed/underutilized）以及被低估的（underestimated）

^① 穆拉特·劳穆林：“从地缘政治看哈萨克斯坦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中担任轮值主席国”，参见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网站 2011 年 6 月 29 日。

16~30 岁左右的“U 一代”^①青年群体成为反政府的主力之一。这个特定群体占阿拉伯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9·11”后美国相继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后，他们中不乏本·拉登的同情者与追随者，甚至成为“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等伊斯兰极端组织招募圣战者的主要对象。但随着阿拉伯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阿拉伯精神已经被贫困、失业和普遍衰退打碎了”^②，突尼斯“U 一代”青年穆罕默德的自焚最终引爆了阿拉伯民主运动之火，阿拉伯青年民生问题凸现，他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也成为同遭经济危机冲击的阿拉伯民众普遍的社会诉求，表明阿拉伯民众的社会诉求已从“9·11”后以暴易暴地抵制与仇恨西方“异教徒”向推动社会民主变革、努力融入全球化的转变，伊斯兰极端主义号召力的日渐衰落即成必然。

二是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重塑的表现。“9·11”后，西方媒体大肆炒作“伊斯兰恐怖论”，并“把‘9·11’事件、恐怖主义同在阿拉伯国家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利用不幸的偶然性，用错误的思想说服世界，将恐怖主义归咎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将合法自卫与侵略别人，将民族解放运动与恐怖主义活动，将为正义献身与恐怖主义行动混为一谈”^③，结果导致伊斯兰教成为“替罪羊”。“道成经典”的伊斯兰教，极为重视《古兰经》和圣训等伊斯兰文化原典的解读，但因伊斯兰文明阐释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以及“9·11”后世界穆斯林在“被审”中陷入无言和失语当中，外界甚至包括伊斯兰世界内

^① 参见穆里尔·阿瑟布格：“阿拉伯之春”，载德国《科学和政治基金会杂志》2011年7月号。

^② Pat Lancaster, “Tunisia: A Catalyst for Change”, Middle East, Issue 419, February 2011, p. 19.

^③ 【埃及】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著，朱威烈等译：《十字路口》，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部也对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的解读产生了分歧。“伊斯兰是和平的抑或暴力的”的质疑,不仅关系到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的认知问题,还关系到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问题,更关系到伊斯兰文明如何融入世界多元文明体系的问题。因此,从伊朗前总统哈塔米的“文明对话”倡议到爱资哈尔大学组织的“伊玛目宣教月”直至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与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历史性会晤等,表明伊斯兰世界的政界、教界和学界力求秉承伊斯兰“创制”传统,对经训作出合乎时代精神的诠释,在还原伊斯兰和平本质的基础上重塑伊斯兰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的影响力能够在这场阿拉伯民主运动中得到进一步扩大,表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阿拉伯社会的普遍共识,且探寻跨民族、宗教和地区的全球认同及其实现途径,则成为中东穆斯林改变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这一现实困境的必然选择。

三是阿拉伯民众欲挣脱阿拉伯“和平与民主”困境的表现。自1967年丧失了耶路撒冷圣地后,巴以冲突跃升为阿以甚至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所有伊斯兰国家都认为,以色列是对伊斯兰国家的最大威胁,是对这个地区的最大威胁。”^①在这种强烈的伊斯兰认同感的驱使下,“巴勒斯坦问题”便成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利益”,也成为阿拉伯民主变革的“重大关切”,2004年阿拉伯世界发表的《阿拉伯改革问题:构想与实施》则强调:

“这个计划在符合充分体现阿拉伯社会共同特点的总体框架要求的

^① 美联社德黑兰1997年12月6日电。

同时，还应使各种能够解决各自面临的问题。这个计划应该允许每个社会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同时又避免相互孤立。这个计划也应为地区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使阿拉伯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比较积极发挥作用的实体。但是，内部改革不应使我们把注意力从处理议程上紧迫的地区性问题转移开。在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在国际决议基础上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①

这份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在“充分体现阿拉伯社会共同特点的”“内部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在国际决议基础上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将“阿拉伯模式”与“土耳其模式”、“伊朗模式”等作了区分。就阿拉伯民族而言，“巴勒斯坦问题”与阿拉伯改革的关系实为和平与民主、和平与发展的关系。在小布什“大中东民主改造”的外压下，2006年巴勒斯坦民众仍将哈马斯等伊斯兰激进势力推向政治前台，但“和平与民主”的希望最终落空；2011年阿拉伯民众又将希望寄予穆兄会等伊斯兰温和势力身上，力求早日挣脱“和平与民主”困境。因为，“巴勒斯坦问题”常成为阿拉伯国家执政者压制民主、不思改革、转移国内矛盾的“挡箭牌”，结果导致中东“和平”与“民主”陷入困境：一方面“巴勒斯坦问题”成为阿拉伯国家民主改革的“遮羞布”，和平成为民主变革的阻碍。另一方面“巴勒斯坦问题”又成为执政者赢取民心、深化民主改革的“标志”，和平又成为民主的推力。而“西方国家的一些决策者认为，抓紧时间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和平进程可以抚慰民意。”但这种想法既“没有考虑到阿拉伯人已经疏远了目前的和平努力，他们认为这些努力反映的是外国计划而

^① 转引自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1 页。

不是民族计划”，还“想当然地认为一份和平协议如果能让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接受，就肯定能让阿拉伯民众接受，而事实上，这样一份协议更有可能被视为一种强加的不公平协议，被抨击为对宝贵事业的‘清算’。”^①2011年穆巴拉克的下台及其受审，就是民众对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维护美以利益而损害国家、民族乃至宗教利益的一种“清算”。西方决策者常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应付穆斯林民众的“一种策略”的伎俩也得到了“清算”，如2011年美国佐格比国际民意调查数据表明，阿拉伯人将“以色列长期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美国干涉阿拉伯国家”看作是“中东和平稳定的最大障碍”。奥巴马在巴以问题上的做法使他的形象受损，因为奥巴马投入大量精力的两件事（巴勒斯坦问题和与穆斯林世界的对话）获得的认可率最低，还不足9%。“美国的威望下滑也是奥巴马当选带来的高期望值破灭的结果，因为奥巴马并不是制造了问题，而是制造了问题会得到解决的期望值。”^②显然，无论是穆巴拉克还是奥巴马都无法破解阿拉伯“和平与民主”困境，阿拉伯民众惟有奋起自救才是解困的正途。于是，这场民主运动以埃及民众推翻亲美以的穆巴拉克等方式将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引出，埃以边界冲突、巴以换俘行动、巴勒斯坦申请入联、巴勒斯坦加入教科文组织等标志性事件的相继发生预示了这场民主运动已对中东和平产生了推动作用。在阿拉伯学者看来，此次的“阿拉伯之春”强调自由、公正、公平和尊严等价值观，并使“公众扮演了领导角色”。而“群体身份得到承认是基本的、普遍的人类需求，

^① 侯赛因·阿迦等：《阿拉伯世界重生于穆巴拉克下台后的埃及》，《华盛顿邮报》网站2011年2月13日。

^② 阿尔弗雷多·哈利费—拉默：“美国调查显示阿拉伯国家公共舆论憎恨美国”，载墨西哥《每日报》2011年7月20日。

巴勒斯坦人也不例外。”因此，巴勒斯坦申请入联之举表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承认这种需求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不仅对巴勒斯坦人至关重要，对‘阿拉伯之春’的精神也至关重要。”^①此次民主运动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将日渐显现。

三

随着“伊斯兰战略板块”在中国总体外交中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我国中东外交面临更多的内外挑战，这场复杂的阿拉伯民主运动更使得我国的中东人文外交面临诸多挑战，但却蕴含更多新机遇，其对策主要包括：

第一，在发掘并利用中阿文明交往中所累积的道义资源基础上，加强中国在中东事务中的话语权，进而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大力宣传中国中东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与利益诉求尤其是“和谐世界”理念，以增强国内外民众对中国中东政策的认同度；（2）在“中阿合作论坛”与中东特使等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加快麦加朝觐、援外医疗、孔子学院、精英培训及友好城市等项目的制度化建设进程，以增强我对阿人文外交具体项目的认同度；（3）中国中东话语权建设正面临“半岛”的政治蜕变与美国互联网外交的内外挤压，将中阿文明交往中累积的道义资源转化为提升中国中东话语公信力的优势资源，藉此置奉行霸权政策的西方国家于道德困境之中以加强阿拉伯社会尤其是“U一代”年轻人对华话语认同度。

可以肯定，随着中东穆斯林对中国中东人文外交上的政策认同、

^① 易卜拉欣·沙尔吉耶：“为什么美国必须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 2011 年 8 月 9 日。

项目认同及话语认同的不断增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里中国形象的好感度将得到相应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会随之扩大。

第二，在加强兄弟般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人文交流，以推动中阿“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关系。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应对：（1）在发展同阿拉伯国家双边关系时，要与不同政治派别、宗教与部落势力、社会精英及年轻人等社会各阶层加强交流、联络情感，扩大共识，在广泛的社会接触基础上开展政府主导、政府参与及政府管理等形式多样的人文外交；（2）在发展同阿盟、非盟、海合会等区域或次区域组织的关系时，绝不利用其教派矛盾谋私利，更不介入教派政治而将中东问题复杂化，并针对中东复杂的人文现状及中阿人文交流的基础打造不同的人文交流项目，如以埃及为主的北非阿拉伯国家的援外医疗、孔子学院及精英培训等，以沙特为主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宗教朝觐、旅游观光及友好城市等；（3）在发展同伊斯兰世界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等跨区域国际组织的关系时，针对这些组织系于伊斯兰认同而拥有 15 亿穆斯林、57 个伊斯兰国家的资源优势特质，以及穆兄会等政治影响力日增的现实，借助泛伊斯兰国际平台来弘扬儒伊文明对话传统则成为提升中阿关系的又一新路径。在这场阿拉伯民主运动的冲击下，伊斯兰会议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旨在“加深伊斯兰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合作并提升组织的国际地位”，这使得中国对伊斯兰世界开展人文外交也变得切实可行。

事实上，开展多边外交是中国在广泛的世界政治事务中实现和增

进国家利益所不可或缺的战略选择，有重点、分层次地开展双边与多边相结合的中国中东人文外交，旨在“大力推进和不断丰富双方的人文交流，促进不同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实现和谐共处”^①，进而推动中阿战略关系，并实现中国人文外交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

第三，在继续推进朝觐外交的基础上，开展中国对阿宗教外交，以拓展中国人文外交空间。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努力：（1）将朝觐活动提至我国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人文外交的战略高度来运作，在弘扬“爱国爱教”传统的基础上鼓励中国穆斯林精英参与朝觐外交，并在特定多边外交舞台上宣传“和谐世界”理念、彰显大国形象以改变中国中东外交中“官强民弱”的现状；（2）作为世界三大宗教发源地的中东，其复杂的人文环境中宗教问题极为突出，在开展我对阿宗教外交时，“要坚持统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大局。一方面，我们应坚持尊重伊斯兰文明，尊重伊斯兰国家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断发展双方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建立起牢固的、充满活力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中国国内的民族宗教问题中，处理好与 10 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 2000 多万穆斯林的关系，一向占有很大的权重。”^②中国对阿宗教外交的内政外交辐射性，也是宗教与国家利益关联性的一种体现；（3）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和宗教政治化趋势以及国内宗教格局的变化，均使宗教成为中国内政外交的突

^① “温家宝在中阿论坛第四届企业家大会开幕式上讲话”，载《新华社》2012 年 1 月 19 日。

^②朱威烈：“试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性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 9 期，第 17 页。

出问题。^①开展对阿宗教外交，旨在“加强同西方国家最感棘手却又具有全球影响的伊斯兰国家的沟通和协调，既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互利共赢，也有利于化解西方国家对华的持续挑衅和施压。”^② 并以其特殊优势丰富中国民间交往的内涵与方式，进而拓展了中国人文外交空间。

^①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底9期。

^②朱威烈：“重新定位中国与中东关系”，《环球时报》2011年3月28日。